

文章编号: 1003-7578(2021)10-016-08

doi: 10.13448/j.cnki.jahre.2021.264

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减贫 效应与生计发展研究^{*}

——以三区三州怒江州地区为例

马明 陈绍军 陶思吉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8)

提 要: 易地扶贫搬迁是三区三州怒江州少数民族脱贫的主要策略,文中以515个样本,分别从生计策略、家庭收入和可持续生计维度,对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移民生计发展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易地扶贫搬迁改变贫困人口生计策略明显,大幅度减少了以农业生产生活为主的低收入家庭和增加了以非农业生产生活的“高收入”家庭。2)易地扶贫搬迁使移民家庭收入增加明显。3)易地扶贫搬迁使移民可持续生计改善明显。4)以非农业生产生活为主的移民生计资本、家庭收入显著高于以农业生产生活为主的移民。5)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和溢出效应明显,生计策略的转型带动了家庭收入的增加和培育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移民可持续发展和增收能力,提出以下建议:需继续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发展特色产业、落实“内生”和“外引”产业帮扶以保障就业;重视各类生计资本的优化组合,增加移民生计可持续的内生推动力;增加移民从事非农经营的机会,鼓励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旅游产业与“特色产品”的线上经营;在加大非农技能培训等扶持的同时需帮扶以农业生产生活为主的移民家庭;做好迁出地的承包地、山林地、宅基地的土地资产流转和增收;重视少数民族移民的社会网络恢复以及文化保留和开发。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效应;生计发展

中图分类号: F304

文献标识码: A

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民族地区曾为脱贫攻坚的“艰中之艰”^[1]。怒江州生态环境脆弱、多民族聚居,98%以上土地为高山峡谷,曾是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州市之一。2020年怒江州26.9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傈僳族、独龙族、怒族和普米族整族脱贫。其中,易地扶贫搬迁10.2万人。如今,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已全部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反贫困政策效果如何、搬迁户的生计转型、可持续生计如何、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是否提高了搬迁户的收入与生计资本,如何强化和精准民族地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这是国家“十四五”时期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脱贫群众5年过渡期的关键。

作为贫困治理的综合性工程,治贫效果的检验尤为重要^[2-3]。易地搬迁扶贫的减贫效应高于社保扶贫与生态扶贫^[4],作为扶贫手段,易地扶贫搬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搬迁与增收的双赢^[5-6],其减贫机制是通过改善区域资源禀赋提升就业增收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减贫^[2]。后扶时期,单维收入贫困将转变为包括资源、能力和机会的多维贫困^[7],强化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培育是后脱贫时代政策制定的目标方向^[8],而如何构建贫困人口生计发展框架是研究减贫的前提和基础^[9]。另外,生计资本在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中的作用不同^[10],而改善资源贫困、能力贫困、机会贫困是易地扶贫搬迁的主要内容之一。后扶时期,如何实现搬迁群众从“有就业”再到“逐步致富”,生计可持续是关键。生计是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的基础上^[11-12],不同资产组合的生计结果不一,搬迁后需围绕生计资本内涵培养其可持续生计的累

* 收稿日期: 2021-5-3; 修回日期: 2021-6-28。

基金项目: 水库移民研究中心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项目(2020KF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172);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研究生项目(2019Y0055)资助。

作者简介: 马明(1992-)男,汉族,陕西宝鸡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移民社会学、反贫困、社会治理研究。

E-mail: ming@hhu.edu.cn

积能力^[13-14]。搬迁使移民的生计策略由农业转向非农业^[13],当绝对贫困基本消除时,非农业减贫优势凸显^[15],非农经济是贫困户摆脱贫困的潜在途径^[16]。因此,生计策略转变是考察其减贫效应的内容之一。

能力贫困会导致收入减少和削弱内生脱贫动力,从而制约脱贫的长效性^[17]。生计资本可分为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18]。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是长期的和可持续的,随时间的增长,生计资本的提升速度会增长^[13,19]。五大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的移民收入水平影响差异明显^[20-21],农业和非农为主的移民生计恢复策略有显著差异^[22-23],移民会对生计资产进行组合来选择某种生计策略^[24-26],拥有的生计资产越多,选择生计策略和增收的余地就越大^[27]。搬迁后,物质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是增收的关键^[28],持续提升低收入人口内生发展动力,需强化职业技能的教育培训^[29]。而自有资产越高的移民,其非农经营收入也显著较高^[30],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提高贫困农户收入最有效的途径^[31]。生计可持续的重点在于五类生计资本的互相建构,生计可持续是其生计发展的内涵和减贫效应的内容之一。同时,使用贫困发生率或收入指标测度贫困是不足的,扶贫开发需注重对于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的培养,将减贫开发的外生性扶贫转化为贫困人口的内生性脱贫^[7,32]。因此,文中从资源禀赋变化(生计策略转型)、家庭收入和可持续生计变化三个维度分析当前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减贫效应和后续生计发展。文中将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防止边疆民族地区发生规模型返贫,切实发挥易地扶贫搬迁的反贫困效果提供参考。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1.1.1 怒江州概况

怒江州总人口55.7万人,位于横断山脉纵谷地带,多为高山陡坡,垦殖系数不足4%,76.6%的耕地坡度在25°以上。怒江州曾是集民族、边疆、宗教、山区为一体的深度贫困地区。既是素质型贫困又是条件型贫困,且具有资源贫困、治理贫困、政策贫困、文化贫困、能力贫困、边境贫困和社会发育程度低等致贫原因^[33]。怒江州搬迁后的移民生计恢复策略有三部分:1)采取赋予搬迁户耕地、林地经营承包权,通过土地入股、托管、代耕代种等方式发展农业产业,盘活承包地经营权,组建专业农村合作社。2)珠海市与怒江州签订东西帮扶计划,通过技能培训和劳务输出推动移民就业。同时,鼓励移民就近、就地就业和自主创业。3)以旅游带动发展,将怒江州的高山峡谷旅游业作为重要扶贫产业,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旅游。

1.1.2 数据来源

笔者在怒江州一市两县展开调研,调研时基本已搬迁一年半。主要通过实地参与观察、发放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来收集云南省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家庭收入、生计资本、人口结构数据等。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调研时按照安置社区入住高低排序抽样选择6个安置点。泸水市2个安置点发放150份调查问卷,兰坪县2个安置点发放调查问卷250份,福贡县2个安置点发放调查问卷150份,根据每户一份的原则共发放550份,收回有效问卷515份。其中,少数民族搬迁户占比98.3%,包含白族、独龙族、傈僳族、怒族、普米族、彝族,涵盖了傈僳族、独龙族等直过民族。

1.2 研究方法

1.2.1 分析框架

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机理在于通过改善区域资源禀赋(资源)提升搬迁群体的就业增收(机会)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力),实现贫困家庭减贫^[2]。文中以三个维度构成分析框架,家庭收入维度是考察减贫政策的最基本维度;可持续生计维度是移民生计能力的综合表现,也是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溢出效应^①体现;生计策略维度主要考察不同家庭生计策略类型的家庭收入差异及可持续生计差异;通过家庭收入、可持续生计的变化,不同家庭生计策略类型的收入、生计差异来综合评价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将移民的生计策略分为六类;文中纳入家庭收入。将家庭收入定义为农林收入、非农经营收入等;文中纳入可持续生计。参照(DFID)将可持续生计定义为通过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同类型资产的组合来获得改善长远生活状况所拥有的和获得的谋生能力、资产和收入活动。

① 溢出效应:某事物、群体一方面的发展带动了该事物、群体的其它方面发展。

1.2.2 生计资本指标体系、赋值及计算

生计核心的资本性质和状况会影响生计策略,从而导致某种生计结果。自然资本指的是移民生计依赖直接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包括家庭耕地面积、耕地质量及所在地的生态环境;物质资本包括维持和发展生计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生活生产工具,一般包括住房结构和面积及家庭总资产;金融资本主要指流动资金、储蓄资金和获取金融资金的能力,一般用家庭收入、银行存款及借贷能力衡量;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资源,主要是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一般用人际交往程度、人情往来次数和花费及人际间信任度衡量;人力资本指的是不同生计策略下维持生计目标拥有的技能,这里用是否有技能培训、家庭非农就业人口和农村合作社参与衡量。另外,由于五种生计资本的具体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文中参考前人研究^[18]。通过客观定量和主观评价来分类赋值,然后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使指标值均处于0~1之间,再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移民单项生计资本总水平,得出0~1之间的综合指数,再计算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值。

表 1 生计资本指标类型和取值

Table 1 Types and values of subsistence capital indicators

资本类型	具体测量指标(二级指标)	符号及权重	赋值(三级测量指标)
自然资本	户有耕地面积(亩)	N1 0.5	水田面积、旱地面积、林地面积
	户居住地生态环境	N2 0.25	Likert 的量表法: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分别赋值 1 分~5 分
	户耕地质量	N3 0.25	Likert 的量表法: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分别赋值 1 分~5 分
物质资本	房屋面积(m ²)	P1 0.3	搬迁房面积(m ²)
	家有资产	P2 0.4	摩托车、小汽车、电视机、洗衣机、冰箱、液化气灶、自来水,有一项计 1,最大 7 分,最小 0 分
金融资本	房屋结构	P3 0.3	土木、砖木、瓦砖、混凝土分别赋值 1 分~4 分
	人均年收入(元)	F1 0.6	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数
	能否贷款	F2 0.13	能否金融机构(银行、信用社)获得贷款,能赋值 1,不能赋值 0
	能否借款	F3 0.13	能否从亲戚朋友处获得借款,能赋值 1,不能赋值 0
社会资本	是否有银行存款	F4 0.13	是否在金融机构(银行、信用社)有存款,能赋值 1,不能赋值 0
	人际交往	S1 0.25	Likert 的 1~5 量表法: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赋值 1 分~5 分
	人情往来开支(元)	S2 0.25	一年内参加红白喜事的开支总额
	人情往来次数	S3 0.25	一年内参加红白喜事的次数
人力资本	人际信任度	S4 0.25	Likert 的 1~5 量表法: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赋值 1 分~5 分
	是否接受相关技能培训	H1 0.4	接受相关技能培训赋值 1,没有 0
	户是否参加农村合作社	H2 0.3	参加农村合作社赋值 1,没有 0
	家庭非农就业人口	H3 0.3	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计策略与家庭收入分析

搬迁户的生计策略转型、家庭收入的变化是检验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效果和后扶时期移民如何通过生计策略实现生计目标的关键^[34]。由表 2 可知,易地扶贫搬迁推动了搬迁户经济结构和生计策略改变。搬迁前,生计策略为纯农业类型和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占比 85.4%、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占比 9.9%、纯务工类型和非农经营类型以及生计多样类型共占比 4.8%,移民基本从事农业生产生活以维持生计。搬迁后,生计策略是纯农业和以农业为主类型占比 23.1%、纯务工和务工为主类型占比为 73.7%、非农经营类型占比 2.1%、生计多样类型占比 1%。易地扶贫搬迁后,搬迁移民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生活。

由表 2 可知,搬迁后移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增加 4.14%,易地扶贫搬迁的增收效果明显。搬迁虽导致六类生计策略类型的移民家庭收入有损伤,但搬迁推动移民家庭生计转型,较大的减少了以农业生产生活为主的低收入家庭,易地扶贫搬迁以促进低收入家庭的生计转型,进而提升低收入家庭收入。生计策略结构的转变带动了整体贫困搬迁家庭收入的增加。由表 2 可知,生计策略为非农类型的移民家庭收入高于为农业的移民家庭收入。搬迁前移民生计策略是纯农业类型占比 45%,人均年收入 7407.7 元;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占比 40.4%,人均年收入为 11476.4 元。而搬迁后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占比 45.2%,人均年收入为 13547.5 元,搬迁后纯务工类型占比 28.5%,人均年收入为 14862.1 元。

表2 生计策略类型百分比与家庭收入
Table 2 Percentage of livelihood strategy types and household income

生计策略 类型		总样本	纯农业 类型	农业为主务 工为辅类型	务工为主农 业为辅类型	纯务工 类型	非农经营 类型	生计多 样类型
搬迁前	百分比(%)	100	45	40.4	9.9	3.7	0.8	0.2
	频率	515	232	208	51	19	4	1
	人均年收入(元)	12069.4	7407.7	11476.4	17027.2	29810.5	28000	36000
搬迁后	百分比(%)	100	3.7	19.4	45.2	28.5	2.1	1
	频率	515	19	100	233	147	11	5
	人均年收入(元)	12569.4	5384.2	8700.7	13547.5	14862.1	20754.6	19540

2.2 生计资本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的核心问题是培育搬迁户的内生发展能力和可持续生计能力。因此,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资本是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的反映、也是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后扶时期移民生计扶持政策制定的关键^[35]。由表3可知,移民可持续生计提升明显,可持续生计资本由0.285376上升为0.344287,上升幅度20.64%,生计可持续能力改善明显。

移民社会资本损失较大,自然资本微降。社会资本从0.088075降到0.06348,下降幅度27.9%。二级指标表明,搬迁后人际交往从0.7986降到0.5167,下降幅度35.3%;搬迁后人情往来次数从0.0951降到0.0271,下降幅度71.5%;搬迁后人情往来开支从0.0916降到0.0702,下降幅度23.36%;搬迁后对他人信任度从0.7762降到0.6556,下降幅度15.6%。宗族关系的弱化和外来人口的融入障碍,导致社会资本损失较大;自然资本从0.073945降到0.071745,下降幅度2.9%。另一方面,搬迁后耕地面积由0.1191降到0.098,下降幅度17.7%,而搬迁后耕地质量由0.5698降到0.5696。

移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提升较好。物质资本由0.053166提升到0.111882,提升幅度110%。移民抵抗生计风险冲击的外部支持增强。究其原因,搬迁后家庭参加农村合作社由72户上升至88户,提升幅度16.72%。移民房屋面积由0.1064上升到0.3711,上升幅度达249%;人力资本由0.034478上升到0.064816,上升幅度88%。就业是核心生计的重点。一方面,搬迁后参加农村合作社由0.14上升0.17,上升幅度21.4%。另一方面,搬迁后家庭成员接受就业培训由0.19上升到0.47,上升幅度达147%,家庭非农就业人口由0.1813上升到0.2836,上升幅度达56.4%。

移民金融资本基本持平,虽然0.035712降到0.032364,但人均年收入由12069.43元上升至12569.43元,上升幅度4.14%。另外,移民搬迁后是否有银行存款由0.23上升到0.25,上升幅度8.7%,这表明移民在农业和非农就业双向支持下,生计在稳步恢复。

表3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量化值

Table 3 Quantitative values of livelihood capital of migrant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资本类型	具体指标	搬迁前	搬迁后	搬迁前	搬迁后	t 检验
自然资本	(N1 ρ .5)	0.1191	0.0980	0.073945	0.071745	3.180***
	(N2 ρ .25)	0.6709	0.6693			
	(N3 ρ .25)	0.5698	0.5696			
物质资本	(P1 ρ .3)	0.1064	0.3711	0.053166	0.111882	-45.719***
	(P2 ρ .4)	0.4230	0.3702			
	(P3 ρ .3)	0.2157	1.0000			
金融资本	(F1 ρ .6)	0.1156	0.1202	0.035712	0.032364	3.521***
	(F2 ρ .13)	0.14	0.13			
	(F3 ρ .13)	0.23	0.25			
	(F4 ρ .13)	0.47	0.31			
社会资本	(S1 ρ .25)	0.7986	0.5167	0.088075	0.06348	20.280***
	(S2 ρ .25)	0.0916	0.0702			
	(S3 ρ .25)	0.0951	0.0271			
	(S4 ρ .25)	0.7762	0.6556			
人力资本	(H1 ρ .3)	0.14	0.17	0.034478	0.064816	-12.08***
	(H2 ρ .4)	0.19	0.47			
	(H3 ρ .3)	0.1813	0.2836			
生计资本总值				0.285376	0.344287	-67.228***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2.3 不同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分析

根据不同生计策略移民所拥有的生计资本和资源禀赋制定后扶策略,是“逐步致富”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考虑非农经营类型和生计多样类型占比不高,将非农经营类型和生计多样类型合并为生计多样类型进行分析。

表4 搬迁前不同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与家庭收入

Table 4 Livelihood capital and household income under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before relocation

生计资本类型	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	生计资本	人均年收入(元)
纯农业类型	0.075	0.052	0.03	0.088	0.037	0.282	7407.7
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	0.075	0.055	0.037	0.088	0.029	0.286	11476.4
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	0.08	0.055	0.048	0.091	0.048	0.324	17027.2
纯务工类型	0.07	0.05	0.063	0.09	0.027	0.306	29810.5
生计多样类型	0.066	0.056	0.072	0.085	0.024	0.312	29600

由表4可知,搬迁前生计资本最好的是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但纯农业类型和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总占比为85.4%,生计资本分别为0.282和0.286,低于生计策略为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纯务工类型和生计多样类型。同时,搬迁前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的生计资本与纯农业类型的生计资本差异不大。其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较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较低。由于搬迁前民族地区多山,道路不通,因而同村间的宗族关系融洽和互助行为频繁。大部分移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维持生计,因而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较好;同时,家有资产少,房屋结构安全性差、生产技能单一等导致借贷融资意愿和能力差。

表5 搬迁后不同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与家庭收入

Table 5 Livelihood capital and household income under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after relocation

生计资本类型	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	生计资本	人均年收入(元)
纯农业类型	0.073	0.108	0.025	0.066	0.078	0.341	5384.2
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	0.074	0.107	0.026	0.062	0.054	0.332	8700.7
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	0.073	0.113	0.033	0.065	0.075	0.363	13547.5
纯务工类型	0.073	0.114	0.036	0.06	0.074	0.363	14862.1
生计多样类型	0.071	0.119	0.052	0.062	0.058	0.371	20375

由表4和表5可知,搬迁后不同生计策略的移民生计资本上升明显,生计策略为农业类型到非农类型的生计资本和家庭收入逐步提高。而且,生计策略由农业类型转向非农类型明显。搬迁后纯农业和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的移民总占比为23.1%,比搬迁前下降62.3%,生计资本分别为0.341和0.332,低于生计策略为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纯务工类型和生计多样类型。而生计策略为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和纯务工类型总占比为73.7%,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纯务工类型和生计多样类型的生计资本相对较好,生计资本均为0.363。纯农业类型和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的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持平,金融资本较差;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纯务工类型和生计多样类型的金融资本显著高于纯农业类型和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搬迁后农业和非农技能的培训使人力资本有了较明显的提升。

2.4 生计转型与发展分析

如图1所示,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综合性治理工程,在民族地区主要以改善家庭资源禀赋、调整生计结构来推动搬迁移民生计转型;同时,以提升可持续生计资本、增加家庭收入来提升搬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增收能力。通过推动生计转型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增收能力来改善搬迁贫困移民家庭的资源贫困、机会贫困和能力贫困,从而巩固脱贫成效。

3 讨论

(1) 前人的研究多从搬迁户的收入测量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应,缺少从家庭收入、生计发展能力、生计策略结构转型综合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应。有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会造成短时间的移民生计、家庭收入的损伤,但其忽略了移民群体生计策略结构的变化和贫困程度不一的差异。文中研究表明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有效的改善了贫困移民家庭收入和可持续生计。虽然易地扶贫搬迁不同程度的损伤了移民家庭的收入,但作为扶贫工程,易地扶贫搬迁优化了贫困移民群体的生计结构,大幅度减少了以农业生产生活为主“低收入”的贫困群体,减贫效果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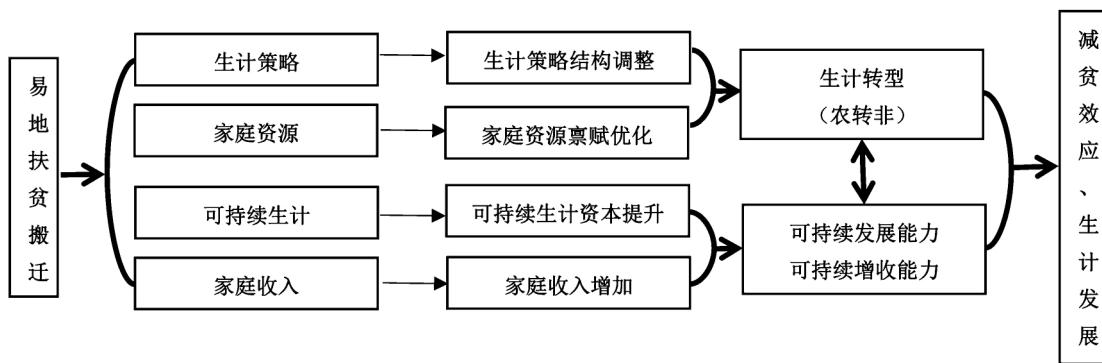


图1 易地扶贫搬迁与减贫、生计发展框架

Figure 1 Framework showing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nd livelihood development

(2) 可持续生计能力是检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溢出效应的关键。前人的研究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因素,缺乏搬迁前的可持续生计数据对比,文中通过对比不同生计策略的搬迁户,分析搬迁前后生计资本和家庭收入的变化,分析移民生计资本的变化规律和不同生计策略下的生计资本和家庭收入,综合考虑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果,更加客观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的反贫困政策效应。

(3) 搬迁户的生计资本和家庭收入改善可以基于可持续生计进行解释,但生计策略的转型用可持续生计框架解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移民对于“生计资本”理性决策受个体意识和禀赋差异较大^[36],仅用量化的生计资本值解释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果是不够的,为了以防掉入数字陷阱^[37],还应结合不同家庭经济类型、不同生计策略的家庭收入综合考虑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另外,不同学者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研究时,生计资本的指标构成各不相同,具有因地制宜的特点。

4 结论

基于怒江州少数民族地区6个安置点515户数据,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在民族地区的减贫效应与生计发展,得出以下结论。

(1) 贫困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和家庭收入提升明显,可持续生计资本由0.285376上升为0.344287。另外,搬迁前移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为12069.43元,搬迁后为12569.43元,整体移民收入上升幅度4.14%。而且,易地扶贫搬迁前,怒江州有85.4%的搬迁移民生计策略是以农业为主,在搬迁后,降到了23.1%且家庭人均年收入为9442.5元;另外,搬迁前,有13.6%的搬迁移民生计策略是以非农业为主,在搬迁后,上升到了73.7%且家庭人均年收入为14204.8元。易地扶贫搬迁改善贫困移民家庭资源贫困、能力贫困、机会贫困效果明显,贫困家庭收入增加和生计改善明显。

(2) 移民生计可持续是易地扶贫搬迁减贫内容之一,生计可持续关注应对生计风险冲击能力和核心生计的提升。应对生计风险冲击能力主要考虑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搬迁后的移民物质资本较好,应对生计风险冲击的外部支持有效改善。而生计资本的改善,增加了采用适合的生计策略以确保生计可持续性的可能性。同时,移民搬迁安置后,应更多的关注社会资本,构建起应对生计风险冲击的内部支持。核心生计的提升主要关注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主要是移民基本权益的保障,人力资本是移民生计提升的关键,主要就业技能的掌握和就业机会的多元化。

为继续改善移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出以下对策:1)建设移民多元化生计技能培育机制,人力资本是增收的核心。一方面,生计转型困难的移民要提供生产性支持和互助性农业就业。另一方面,针对青年人等移民群体需提供非农就业培训和劳务输出,建立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相嵌的多元化就业培育机制以保障生计可持续;2)需重视生产性工具的援助,增加非农技能培训和就业;3)做好移民基本权益的保障和农村合作社建设,保障移民的迁出地的承包地、山林地、宅基地获得常态化的、稳定有序的土地资产增值收益;4)就业是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应继续进行“内生”和“外引”产业的落地,需继续与东部发达地区进行产业合作,东西帮扶,提升产业质量,进行产业升级,为移民提供可持续的就业保障;5)重视不同生计策略下的移民生计可持续,提高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资本的优化组合,探寻不同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优化路径,提高生计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 [1] 郭景福,夏米斯亚·艾尼瓦尔.“三区三州”减贫与发展的多维路径与对策探析[J].民族学刊,2020,11(6):9-16;151.
- [2] 张涛,张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就业减贫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7(4):129-136.
- [3] 郑继承.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释析与新时代减贫战略展望[J].经济问题探索,2021(1):40-51.
- [4] 李怡,柯杰升.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1):9-21.
- [5] 李俊杰,郭言歌.“三区三州”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机制优化探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5):30-37.
- [6] 张涛,张琦.新中国70年易地扶贫搬迁的就业减贫历程回顾及展望[J].农村经济,2020(1):39-45.
- [7] 何雄浪,史世姣.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我国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减贫脱困效应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42(1):51-62.
- [8] 姜安印,陈卫强.贫困时代转换的经验证据、特征研判及路径选择[J].经济学家,2021(3):63-70.
- [9] 郑瑞强,高驰.扶贫治理现代化与国外减贫研究的进展和热点[J].江汉学术,2021,40(2):24-34.
- [10] 高帅,丛建辉.特困地区可持续减贫: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22(6):21-32;51.
- [11] CHAMBERS R,CONWAY G R.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R].IDS Discussion Paper No. 296.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1.
- [12] ROBERTS M G,杨国安.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方法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J].地理科学进展,2003,22(1):11-21.
- [13] 徐锡广,申鹏.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1):103-105.
- [14] 李树苗,徐洁,左冬梅,等.农村老年人的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J].当代经济科学,2017,39(4):1-10;124.
- [15] CHRISTIAENSEN L,DEMERY L,KUHL J.The(Evolving) role of agriculture in poverty reduction –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Social Policy,2011,96(2):239-254.
- [16] HAGGBLADE S,HAZELL P,REARDON T.The rural non-farm economy: Prospects for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J].World Development,2010,38(10):1429-1441.
- [17] 左停,李颖,李世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机制与路径分析—基于全国117个案例的文本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4-12;174.
- [18] 孙海兵.水库移民生计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9-21.
- [19] 王君涵,李文,冷淦潇,等.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10):143-153.
- [20] 刘伟,黎洁.提升或损伤?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9,24(3):210-218.
- [21] 李聪,刘若鸿,许晏君.易地扶贫搬迁、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不平等—来自陕南的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9(7):52-67.
- [22] 曾福生.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构建[J].求索,2021(1):116-121.
- [23] 冯伟林,李聪.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7(2):73-81.
- [24] 伍艳.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平武县和南江县的调查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3):88-94;112.
- [25] 赵雪雁,李巍,杨培涛,等.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4):111-118.
- [26] 苏芳,蒲欣冬,涂中民,等.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6):119-125.
- [27] 黄志刚,陈晓楠,李健瑜.生态移民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J].资源科学,2018,40(2):439-451.
- [28] 刘林,徐天骄.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4(1):24-32.
- [29] 王亚华,舒全峰.中国精准扶贫实践的溢出效应[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25(2):49-57.
- [30] 李聪,王磊,李明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易地搬迁、家庭贫困与收入分异[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7):140-150.
- [31] 管睿,王文略,余劲.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内生动力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6):130-139.
- [32] 王志刚,封启帆.巩固贫困治理策略: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J/OL].财经问题研究:1-10[2021-06-2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096.F.20210412.0902.002.html>.
- [33] 何祖坤,沈向兴,宋媛,等.人类减贫事业的“怒江实践”[J].云南社会科学,2020(6):1-8.
- [34] 马明,陈绍军,陶思吉,等.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生计资本与家庭收入影响研究—以云南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35(8):1-10.
- [35] 谢大伟.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来自新疆南疆深度贫困地区的证据[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9):66-71.
- [36] 刘精慧,薛东前.陕北黄陵县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生计策略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6):156-163.
- [37] 杨农.数字陷阱与科学决策[J].中国金融,2014(11):28-30.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and livelihood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Nujiang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MA Ming, CHEN Shaojun, TAO Sij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Poverty and ethnicity are highly coupled,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s the main strategy for ethnic minorities to get rid of poverty in Nujiang prefecture. Based on 515 samples, we analyzed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of ex-situ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migration, and the livelihood development of immigrants in Nujiang prefectur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family income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ly, the strateg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livelihood of the poor families, grea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who are mainly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and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high-income" households who are engaged in non-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Secondly, the incomes of relocated families that participat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irdly,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relocated residents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Fourthly, the livelihood capital and family income of immigrants whose main activities are non-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hose main activities are based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Fifthly,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are obviou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has promoted the increase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cultivated the capac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mpro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come growth of immigrant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continuing to increase employment skills training, developing specialty industries and implement of "endogenous" and "externally introduced" industrial assistance to ensure employmen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optimized combin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livelihood capital, increas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immigrants; increasing the opportunities for immigrants to engage in non-agricultural operations, and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d online operations of ethnic minority "special products"; while increasing non-agricultural skills training and other support. It is necessary to help immigrant families whose main focus i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life, do a good job in the transfer of land assets and income increase of contracted land, mountain forest land, and homestead in the emigration area,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ethnic minority immigrants and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Key words: minority area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livelihood development